

中国图书论集

程焕文编

商务印书馆



89452

G256.1-55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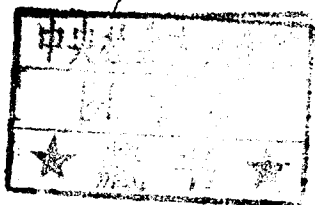
中国图书论集

程焕文 编



200183407

DI70/06



商务印书馆

1994年·北京

ZHONGGUO TUSHU LUNJI

中国图书论集

程焕文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01-5/G·166

1994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27 千

印数 2000 册

印张 17 7/8

定价: 15.80 元

目 录

中国图书文化的演变及其意义(代序)	程焕文(1)
-------------------------	----------

一、绪论

说“书”	查启森(27)
中国书史研究纵览	查启森(35)
介绍有关书史研究的新发现与新观点	查启森(47)

二、简帛文化

我们最古的书: 甲骨文——龟册	懿 恭(62)
关于殷墟甲骨的一般知识	罗福颐(68)
简牍检署考(选)	王国维(79)
六十年来我国发现竹木简概述	陈 直(86)
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	朱德熙 裘锡圭(94)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	韩中民(104)

三、写本文化

关于造纸术的起源	潘吉星(115)
敦煌千佛洞文物发现的经过	傅振伦(127)

敦煌文物被盗记	王重民(133)
敦煌遗书概述	史树青(141)
《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	王重民(151)

四、印本文化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	张秀民(164)
中国版刻的发展过程	赵万里(187)
宋代刻书述略	李致忠(196)
南宋刻书地域考	张秀民(224)
元明两代的木活字	张秀民(237)
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	王重民(247)
《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其作用	胡道静(265)
清代印刷史小纪	净雨(279)

五、近代图书文化

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美〕钱存训(297)
墨海书馆时期——世俗书刊的开始	汪家熔(323)
新出版和新出版业第一人——王韬	汪家熔(333)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	贺圣铎(346)
晚清的官书局	梅宪华(364)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	李泽彰(390)
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	戈公振(402)
马恩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	胡永钦等(413)
列宁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	张允侯(471)
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出版与传播	雍桂良(489)
党在早期设立的出版发行机构	曹予庭(500)

六、现代图书文化

- 四十年出版事业回顾方厚枢(513)
我国印刷技术发展的三十五年《印刷技术》杂志编辑部(519)
新华书店简史郑士德(527)

七、中国图书的数量与装帧艺术

- 中国古籍的数量吴 枫 王树伟(539)
中国书籍装订术的发展蒋元卿(545)
后记(560)

中国图书文化的演变及其意义(代序)

程 焕 文

一、中国图书文化的界定与研究内容

为什么要提出“中国图书文化”这个名词？是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标新立异？事实恰恰相反，早在1951年，赵万里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图书史时就已提出了“简牍文化”、“卷轴文化”和“雕版文化”诸说法。近年来，汪家熔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图书史中又提出了“中国近代图书文化”这个名词。这些名称的提出绝非偶然，它实质上反映了部分有识的专家学者对于国内外长期以来在研究中国图书，尤其是中国图书历史的过程中过分注重对图书的内在联系（文字、载体、制作技术、物质形态）的研究，而忽视对图书外在联系（图书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相互联系）的研究的不满足。笔者正是基于与这种“不满足”的强烈“共鸣”，才尝试着提出了“中国图书文化”这一名词。

作为“中国图书文化”这一名词的始作者，要准确、精炼、科学地界定这一概念是比较困难的。仅从“文化”这一词的界定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其定义已达二百多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既然如此，到不如姑且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一广义概念更好。中国图书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是有其特定的内涵的。要明确这一内涵，首先就必须界定“图书”这一概念。

刘国钧先生在《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一书中说：“图书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而用文字或图画记录于一定形

式的材料之上的著作物。”

查启森先生在《说“书”》(《图书情报知识》,1985年第4期)一文中言:图书“是一种用文字,或兼及图象等信息符号,有目的、有意识地,并采用一定的方式记述知识的载体,是一种物化了的知識。”

谢灼华先生在《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称:图书“是有目的地用各种手段把文字记载在一定的载体上,其内容能提供多人阅读和多次使用的各种著作或材料汇编。”

上述有代表性的观点大同小异,虽然都基本上道出了图书的关键之所在,但都并非十全十美。纵观中国图书的发展历史,无论是简帛,写本书,还是印本书,或者缩微胶卷与平片,甚至机读磁带、磁盘、光盘,它们都包含着下列几个基本构成要素:

1. 以传播交流为目的,而经过整理的,且可以阅读的信息(主要是知识)。这是图书的本质属性。信息(知识)是一个很广的概念,作为构成图书的信息(知识),一则必须是以传播交流为目的信息(知识);二则必须是经过整理了的,或者说是经过条理化系统化了的的信息(知识);三则必须是可以直接阅读,或借助其它工具阅读的信息(知识)。因为图书的内容并不能,也不可能包罗一切信息(知识)。这一本质属性的确定是我们区别其它物化了的的信息(知识)的根本依据。如所谓的“石头的书(石鼓文等)”、“青铜的书”、“甲骨的书”等,其物化了信息(知识)或则是为了查考,或则是为了祭典、纪念,而不是供人阅读,不是以交流为目的的,所以不能称作“图书”。再如档案、书信、文告等因不是以传播交流信息(知识)为目的的,也就不能称为“图书”,但是,一旦将其进行整理用作传播交流,它们也就转化为“图书”了,如“档案汇编”、“书信集”、“文书汇编”之类即是。又如各种数据、图表本身也不是图书,但一

经整理用作传播交流,它们也就转化成了图书,如“地图集”、“画像集”、“数学用表”、“电话号码簿”等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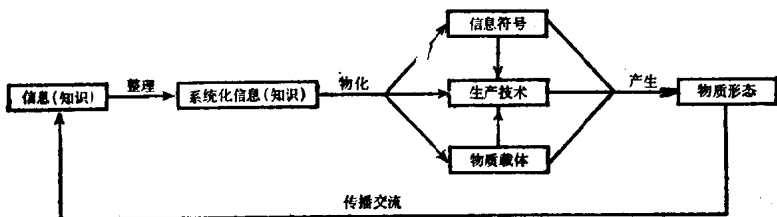
2. 信息符号(主要是文字)。这是信息(知识)赖以表达的媒体,只有借助这种媒体,信息(知识)才能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得以表达。

3. 物质载体。这是信息(知识)通过信息符号的表述而赖以存在的依据。不同的时代,图书的物质载体亦有所不同,出现过竹木、丝绸、纸、胶卷(片)、磁带(盘)等。

4. 生产技术。生产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信息符号附着到载体上的技术,如抄写、印刷等;二是把载体加工成各种形态的技术,如“杀青”、“入潢”、“装帧”等。生产技术是将信息符号和物质载体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才使得信息(知识)得以物化。

5. 物质形态。物质形态是信息(知识)经过物化后最后呈现出来的形式和赖以传播交流的形式。不同时代的图书有着不同的物质形态,如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平装、精装等,但无论哪种形态图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方便传播交流和使用。

这五要素的构成与关系可用下图表示为:



根据上述五要素的关系,图书的界定可以表示为:图书是以传播交流信息(主要是知识)为目的而用信息符号(主要是文字)、物

质载体和生产技术将经过整理的信息(主要是知识)物化了的可以阅读或查考的信息(主要是知识)产品。

图书不仅是一种信息产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社会产品。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图书具有两重性。任何一部书,无论它的内容属于哪个学科,只要它一产生,就既是社会的精神产品,又是社会的物质产品。因为从其物质形态来看,它是社会的物质产品,而从它的意识形态来看,它又是社会的精神产品,但是,后者是最根本的。

同时,图书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它也就不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事物。它随着社会和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又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而变革。因此,研究图书文化也就必须把一定时期的图书放到一定时期的整个社会的发展之中进行考察。从这一点上来讲,图书又有着两层关系,一是图书的内部关系,即图书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图书的外部关系,即图书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等诸方面的相互关系。在这两层关系中,图书的外部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制约和决定着图书的内部关系,而图书的内部关系则又反作用于图书的外部关系,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可以把“图书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作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图书的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的总和。这样,“中国图书文化”的界定也就自然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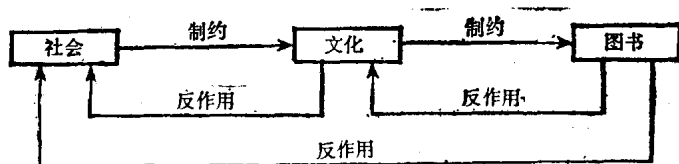
这一界定的确立,实质上也就确定了(中国)图书文化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从图书内部的五要素来看,图书文化并不把图书的各要素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也不可能将诸要素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例如:研究图书内容的有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科学等;研究图书编纂的有文献编纂学等;研究图书目录的有目录学;研究图书版本的有版本学;研究图书文字的有音韵学、文字学、

训诂学、校讎学等;研究图书装帧的有装璜艺术;研究图书载体的有造纸技术与工艺等;研究图书制作的有印刷技术与工艺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图书的某一构成要素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从图书的某一个部分或侧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的。图书文化不可能具体地系统地去探究这一切,否则,图书文化也就成了包罗万象之学。它只能以其诸要素产生、发展、变化的原因、结果,而不是其全部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内容从纵向和横向上研究其相互关系。如知识、造纸术、印刷术、装帧术等的产生、发展、变化对各要素,尤其是作为诸要素整体的图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作用 and 影响。

从图书的外在关系来看,图书文化则主要是研究社会、文化等的产生、发展、变化对图书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化的作用 and 影响,和图书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化对社会、文化等的发展、变化的反作用 and 影响。当然,图书文化也不可能把社会、文化等作为专门的研究内容。这些正是(中国)图书文化所研究的全部内容的精髓之所在。

二、图书文化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

图书文化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高尔基曾说过:在人类社会所创造的许多东西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就是书。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图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如下图),也就不难发现其意义之所在。



1. 图书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标志。图书是人类在其发

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定的社会(主要是生产方式)决定着一定的文化,而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图书文化又受到文化的制约。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或多或少地直接制约着文化与图书的发展,而图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则又较全面地反映了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面貌。从图书的形式来看:一方面,社会、文化的每一次发展与变革决定了图书形式的发展与变革,如文字的产生与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生产技术的发展(如制墨技术、造纸技术、印刷技术等)、文化的交流传播(如中国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外传、佛教与西方近代印刷术等的输入)都直接地推动着图书形式的变革与发展;另一方面,图书形式的发展与变革又部分地生动地再现了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变革。从图书的内容来看:一方面,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变革决定了图书的内容,图书内容的存在取决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图书的内容又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一个时期或一个阶段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总是或多或少地会在图书的内容中留下烙印,得到反映。例如:《二十四史》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发展变化的一种反映,而每一史则又是一个时期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发展变化的一种反映。从这一点上讲,图书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和缩影。

2. 图书是人类社会与文化进步的阶梯。从纵向的继承与发扬的关系上来看,人类社会能够一天天发展下去,而且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进步,就是因为后人能够以继承前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借助图书来实现的。图书作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最重要最宝贵的精神产品,是人类赖以继承和借鉴前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和减少与避免许多重复劳动的工具。历代民众都深明此道,统治者亦不例外,唐高祖李渊所说“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大诏令集》卷81),唐太宗李世民所说

“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卷554），宋太宗所言“千古治乱之道，尽在其中”（《麟台故事》卷四），即是对图书的这种社会作用的阐发。今天，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认知过去的社会、过去的文化，并从中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发展，就是因为有了图书。如果没有图书，每一代人就都必须毫无凭藉地一切从头做起，人类社会与文化恐怕仍然还停留在“口传耳闻”的原始状态，也就不可能取得巨大的发展，人类社会与文化在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想象的。从横向的传播与交流的关系上来看，一方面，各个民族、地区、国家及其文化的发展总不可能是完全封闭孤立地进行的，总是会或多或少的与其它民族、地区、国家及其文化的发展发生相互作用与影响的，而图书则正是各个民族、地区、国家的文明与文化传播交流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人们通过图书，借鉴其它民族、地区、国家的经验，吸收其成果，互相取长补短，丰富本民族、地区、国家的文化，共同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的今天，这种传播与交流更加显得迫切和重要。人们常把图书与能源、材料三者称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三大支柱，就是对图书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充分估价。所以，莎士比亚说：书籍是世界的营养品。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地区、国家的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也无不依赖于图书而进行的，离开了图书，其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与普及也就不可想象。第三方面，图书是维护社会统治和进行社会变革的工具。从统治者来看，它们一是利用图书灌输符合其统治的思想与文化，二是通过禁毁图书，竭力排斥不利其统治的思想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官守其书”、“钦定图书”、焚书坑儒、文字狱、……诸此种种都是例证。从被统治者来看，它们为了推翻腐朽反动的统治，进行革命，也极力利用图书来灌输进步的、革命的思想与文化，为革命与斗争

大造舆论。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古今中外无数的事实也都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图书既是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产物，又是推动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巨大力量，其作用与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三、中国图书文化的分期与演变

中国图书文化源远流长，要充分的认知中国图书文化，探寻其发展规律，那么，划分其历史时期是十分必要的。而要划分其历史时期，确定其分期的标准自然是最首要的问题。中国图书文化作为一门专门的文化，它有着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因此，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按照中国史的分期来分期。只有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中国图书的发展结合起来，才可能得出较科学的分期标准。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着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但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又并不是与之完全同步的发展。因此，以在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中对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与变革最具直接的决定性作用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革作为中国图书文化的分期标准是比较科学的。因为，这些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与中国图书文化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发展和变革总是基本上相吻合的。

同时，必须指出，中国图书文化的分期决不是将中国图书文化绝对地分断。在中国图书文化的分期中，前一个时期就已孕育着后一个时期的胚胎，而后一个时期也往往存在着前一个时期的痕迹，这实际上是新旧事物交替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例如：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在中国图书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两项伟大的发明并不能说明它一经产生，其所处时代的图书文化就立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只是在经历了一段时期以后才得以广泛使用，并真正发挥其划时代作用的。所以，根据具体情

况，发明造纸术的汉代和发明印刷术的唐代都不能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端，恰恰相反，它们都正处在前一个时期的发展高峰。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以中国图书文化在一定阶段的主要面貌作为运用上述标准的主要依据的。

根据上述认识，我们可以把中国图书文化大体上划分为5个时期：

1. 简帛文化时期(殷商——汉)

这一时期的断限是以简帛的产生和造纸术的发明作为前后断限标准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简策实物是解放初在长沙一带发现的战国竹简。过去，人们在中国图书史的分期中多以春秋战国作为简帛时期的上限，这一点是十分值得商榷的。我认为将简帛文化的上限推到殷商(甚至更远)应该还是比较客观的，其主要依据有下列几点：

(1) 从文献记载来看，《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文解字》解释“册”字和“典”字：“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古文册从竹。”“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兀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古文典从竹。”无论这些解释是否完善，“册”与“典”为“竹简”之象形字当是无疑。

(2) 从考古发现来看，甲骨文中亦有不少“册”、“典”之象形文字，而这些象形文字在金文中也得到了印证。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至少在殷商时代就已有了简策；二是简策既然能被甲骨文和金文记载，自然不会晚于甲骨文和金文的时代。正如郭沫若等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一文中所言：“殷代除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简书和帛书，《周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也有册字和典字，正是汇集简书的象形文字。但这些竹简所编纂成的典册，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

年,恐怕不可能多见。帛书也是一样。”

(3) 应该说除了郭沫若所言简帛因质地问题难以埋藏 3000 多年的原因以外,在春秋战国以前,“学术统于王官”,文化与图书由少数奴隶主所垄断,未能得以广泛流传,也不失为今天难以见到春秋战国以前简帛的重要原因。

简帛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图书,而且在殷商至汉这 1000 多年的时间内,它也是我国图书的主要形式。它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中国图书文化发展的基础。

在造纸术发明以前,竹木缣帛作为图书的物质载体,既比较方便书写,又容易得到,因之,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写在简帛之上的。简帛作为这一时期图书的主要形式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如果说简帛文化在春秋以前的情形,因“文献不足征”,我们尚不能确切地全面地加以说明的话,那么,简帛文化在春秋以后的情形应是一目了然了。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学术统于王官”的局面被打破,开始形成了“学术下于私人”的局面,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一阶段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文化汇集、交流的第一次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简帛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部分从贵族阶层没落的“士”利用原来掌管和熟悉先王典籍的条件,将传统的文化学术予以广泛传播;而另一部分由小私有者上升的“士”则又将民间的文化带进大雅之堂,与传统的文化学术进行融合。他们招收门徒,讲学论道,相互批驳,游说人君,进而著书立说,这一切无不是凭藉简帛(图书)得以进行的,以致于“今天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墨子·贵义》)诸子百家利用收集、整理的图书,纷纷著书立说,涌现了一大批后世称为“子书”(或列为经书)的著作,如《论语》、《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管子》、

《韩非子》、《公孙龙子》……。其中以孔子收集、整理、编定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功绩最大，对中国以后几千年的社会和文化都产生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和影响。所有这一切著作都是书写在简帛之上的，也是利用简帛得以流传的，可见，简帛文化在加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和巩固其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统一文字”、“焚书坑儒”等一系列文化政策，使得春秋战国时期一度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被打破，更可惜的是，民间的先秦著作被大量焚毁，导致了我国图书文化史乃至中国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

汉朝建立以后，一方面除“挟书禁令”，民间藏书成为合法，诸子百家之书得以复出和流传；另一方面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地位得到了确立，儒家经典得到了发展，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在以后几千年中中国文化思想的主导。这一阶段实质上是中国文化汇集、交流的第二次大变革时期。在这一阶段，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汉代藏书中的贡献最为卓著。“今文经”的整理与“古文经”的发现和整理，导致了在以后 1000 多年的中国文化史上的“今古文之争”；而刘向刘歆父子大规模整理典籍的工作及其整理文献的成果——《别录》和《七略》不仅开创和奠定了目录学、图书分类学、编目学、校雠学、版本学等诸学科的基础，而且对宋以后汉学、考据学、校勘学、辑佚学等的产生和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此以外，《新语》、《新书》、《春秋繁露》、《论衡》、《史记》、《汉书》、《屈原赋》、《尔雅》、《说文解字》、《汜胜之书》、《伤寒杂病论》等在中国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自然科学诸方面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当然，所有这些著作亦都是凭借简帛得以保存和流传的。